

中国海权优先战略与海军转型*

■ 杨 震 郑海琦

【提 要】 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苏联解体使来自北方的陆权安全威胁得以解除，经济发展在国家战略目标中的权重进一步上升。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以及台海局势恶化和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中国地缘政治重心正从陆地转向海洋。海权优先成为中国地缘战略的选择。海军是海权构成的基本要素。为了满足中国发展海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海军开始战略转型，这样的转型在提高海军战斗力、改善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同时，也将对亚太地区海权战略格局产生影响。

【关键词】 海权 海洋强国 海军转型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 D8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7)08-0078-04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是一个表面积 70.8% 被海洋所覆盖的蓝色星球。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1] 人类生存位置距海洋的距离与其文明程度之间明显存在着一种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人类的未来发展与利用和开发海洋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控制、开发、利用海洋成为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各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可以说，决定未来大国命运的地缘因素就是海洋。有中国学者认为，海洋是擎托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崛起于世界舞台的综合性战略空间。^[2] 冷战结束后的中国面临着已经发生巨变的地缘政治环境，海权优先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作为海权的基本构成要素，海军在中国海权建设中占有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为了满足中国发展海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海军开始战略转型。转型内容包括军种职能、作战区域、海军功能、兵力结构等方面。

一、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地缘政治形势

海洋和陆地是地球表面最基本的两种形态，相应地，地缘政治的两种基本理论便是海权论和陆权论。世界许多国家是濒海国家，既有陆地邻国又与它国隔海相望，在地缘战略的发展上，面临着如何处理二者

之间关系这个重大战略问题。而中国陆海兼备的特点则更为明显。中国在陆地上深入欧亚大陆的腹地，有 2.2 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陆上接壤的国家有 15 个；中国又濒临世界上最辽阔的大洋，有 1.84 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与 8 个国家海上接壤；中国的边缘海面积约 472 万平方公里，拥有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海岛约 6900 个，岛岸线总长 1.4 万公里。从现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既位于欧亚大陆又濒临太平洋，处于世界海洋地缘战略区和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的交接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国在地缘战略的发展方向上，也有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而安全威胁也来自这两个方向，如来自陆权大国或海权大国的巨大压力。冷战结束后，中国陆上地缘战略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使中国北部陆疆的稳定与安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苏联解体及其继承国的相对乏力使中国漫长的三北地区出现了和平、稳定、友好、相互信任的局面。在濒海方向，中国虽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濒海大国，但地处太平洋西岸，只与一个大洋相邻，海洋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并且由于中国边缘海又被第一岛链包围，实际处于半封闭状态。^[3]

美国学者索尔·科恩（Saul B. Cohen）认为，中国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 2011 年度重大项目《当代国际核政治和我国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1&ZD181）、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海洋专项基金项目《以国际法为中心的南海法律战研究》（项目编号：16JCHY09）、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 2016 年度重点项目《日本海洋战略跟踪研究》（项目编号：CAMA2016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冷战的大多数时期位于欧亚大陆的轨道之内，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在过去20年中，一股强大的海洋经济和海洋导向已经嫁接在封闭的大陆型中国政治之上，虽然中国整体上仍是大陆国家。沿海地区，众所周知的“黄金海岸”，增加了中国地区的海洋属性，让北京从欧亚大陆区域中剥离出来，具备了单独地缘战略区域的地位。^[4]

如何在地缘方面趋利避害、发挥优势，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级地缘大国的关键性因素。

二、中国地缘战略选择：海权优先

鉴于上述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必须在海洋和陆地二者之间确定地缘政治的重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自晚清的“塞防”“海防”之争以来，中国始终在陆海两个方向上存在选择。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始终是在陆地而非海洋。事实证明，陆权优先的战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演进、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海外利益的增加，情况发生了变化。海权优先成为中国新的地缘战略选择。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开始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对于海外能源的需求稳步上升。著名学者张文木认为，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5]此外，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逐渐增多。由此而来的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问题——这种维护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前者如近年来日益为国家所关心的海上通道安全，后者如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这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下维护海外安全利益所面临的新课题。^[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前实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海外利益。发展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无疑是维护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最佳手段。

其次是防务领域的压力。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

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的北方威胁已经消失，陆地边境问题除中印边境外已经基本解决。与此同时，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却大幅增加：与日韩的海洋权益争端有增无减；台湾问题趋于复杂，甚至一度导致1996年的台海危机；南海问题开始变得国际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美国不同且国力增长迅速的中国锁定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1992年开始的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将其兵力直接前推至欧亚大陆国家的濒海地区，其远程常规精确弹药的打击范围直接覆盖欧亚大陆纵深。且2011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干预作战能力（美国将其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量身定做了空海一体联合作战概念。在该作战概念中，美国公开宣称：“当前，毋庸置疑，中国是惟一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对美国的影响力及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送带来重大和持久威胁的国家。更为复杂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意公开说明其防御力量持续壮大的理由；几任美国国防部长及其他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外，中国还是惟一未施行民主体制的世界大国，这令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必须评估美国是否有能力向西太平洋地区成功进行力量投送，以捍卫美国的利益并保护其伙伴国和盟友。”^[7]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钓鱼岛之争已经成为近几年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因素。^[8]换言之，中国正在承受来自海洋领域越来越大的防务压力。以往以陆权为优先的地缘战略明显不适应现在的安全形势，海权优先成为合理的选择。

最后是外交领域的推力。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也得到提升。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外界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疑虑也有期待。其中的期待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海洋领域也有公共产品，比如海上通道安全等。从冷战后的实际看，作为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实行单边主义，而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积极性相对下降，这迫切需要有新的大国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使供给来源多元化。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承担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责任。^[9]通过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不仅可以有力反驳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搭便车”的指责，还可以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提高自身国际地位。

由此可见,有利的地缘政治态势和防务领域的压力、经济领域的动力以及外交领域的推力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海权潜力得以开发,并正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毋庸置疑,现阶段的中国正在向海洋强国的方向迈进。

三、中国海军的转型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7年4月15日发布报道称,中国海军正在转型。这场转型在今后多年都会产生影响。大量的军事投资及海洋战略方面的至关重要的变化,使得从传统的“褐水”(近岸)海军向“蓝水”(远洋)海军的重大转变成为可能。其结果是,中国海军舰艇越来越多地在本地区海域以外活动,参加更多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行动,并寻求和获得使用世界各地港口的新机遇。中国海军即将成为蓝水海军。^[10]笔者认为,中国海军的转型是海权思想的产物,包括成为蓝水海军,但是不应局限于此。转型内容应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军种职能的转型。中国海军原先是军政与军令统一的集合体。所谓军政,就是战斗力生成系统,其主要职能是训练与行政管理;所谓军令,即战斗力释放系统,主要负责作战。在2016年开始的军事体制改革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精神,海军开始向专职军政系统转变,其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海军建设,而作战职能则移交给战区。此次军种职能的转型意味着中国海军正向着专业、高效的方向发展。

二是技术形态的转型。江泽民同志指出:“人类战争在经历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阶段后,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11]由于国力和其它诸多原因的限制,中国海军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机械化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海军继续完善机械化建设,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着重解决信息化总体水平不高、联合作战体系存在短板、官兵综合素质尤其是信息化素质不够高等突出问题,逐步构建与打赢信息化海战需要、与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信息系统是海军遂行海上军事行动的中枢,是形成海上体系作战能力的主要支撑。与发达国家海军相比,中国海军信息系统建设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一些重要领域仍处空白。据此,中国需要

把加强信息系统建设作为转变海军战斗力生成模式、建设信息化海军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强化岸基信息系统、天基信息系统、空基信息系统和水下信息系统建设,推动信息感知关键节点由陆基、海基向空基、天基拓展,信息传输向网络化、体系化发展,指挥控制向战略战役战术交互融合、兵力指挥与武器控制一体联动迈进。^[12]

三是海军功能的转型。建国以来,中国海军的功能一直比较单一,是以抗登陆为主的海上作战。新形势下,随着海上航运安全、海外公民及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海上护航、海外应急救援以及必要时撤离海外公民等海外行动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海军经常性的重要任务。^[13]中国海军的功能正在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型,并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军种。

四是兵力结构的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海军采取的“空潜快”方针,是在装备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以陆制海”思维的产物。^[14]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的需要,瞄准世界强国海军武器发展的趋势,中国根据当前海区自然地理纵深短浅等特点,重点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大中型面作战舰艇,先进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远程多功能海上作战飞机,海上(水面、水下、空中)无人作战平台,高性能对空对海对岸导弹等,同步发展作战保障装备,切实解决制约当前海军体系作战能力特别是远海作战能力的装备短板,加快形成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以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具备水下、水面、空中相结合,远、中、近相衔接的立体打击能力。^[15]

五是作战理念的转型。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统一与国家海洋权益,仍是当代中国海军的首要任务。而新军事革命与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使中国海军积极防御的战略及作战样式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进入高技术战争以来,海洋方向对国家安全军事威胁已经主要体现为从数百甚至上千千米以外的空中、水面和水下机动平台向陆地沿海乃至纵深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发射大量精确制导弹药,以远距离、非接触的火力突袭摧毁国防体系及重要基础设施,妄图使我国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为有效应对和防御这种全新形态的战争威胁,就必须

把海洋方向国防力量的部署能力和警戒、防御范围尽量前伸。与此同时,能够以积极防御战略前出打击、摧毁敌国的各种海上军事目标乃至其战争能力,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这就要求现代海军力量必须具备远洋部署和机动作战能力,只有建立和发展在战略上具有主动进攻能力的海上作战力量,才能做到对敌国的有效威慑和反击。^[16]换言之,中国海军的作战理念正在由单一防御向攻防兼备转型。

六是作战区域的转型。这里主要是指从近海向远洋的转型。人民海军依然是中国军事行动的先头力量,其军事行动能力要延伸到西太平洋以外区域,深入到中国所说的“远海”区域。在这些区域的军事任务包括:打击重要海上通道上的恐怖主义活动、海盗活动和外国封锁活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开展海上外交和区域性威慑活动;进行演练,防止像美国这样的第三方势力在台海、东海或南海冲突中干涉邻近中国海岸的军事行动。新军事变革(RMA)也对海军发展以及远海作战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与其他军种相比,海军的规模较小、行政层次更为简单以及更加注重技术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能够更加迅速和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海军本身还下辖海上、空中以及地面作战力量,因此能够成为基于信息化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试验性军种。信息化条件下海军作战行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深化和拓展作战空间,并以此增强生存能力以及夺取作战先机,而这种要求与远海作战的构想高度一致。^[17]

四、结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苏联解体带来的北方安全威胁的消除使中国得以腾出手来发展其巨大的海权潜力。海上安全形势的恶化、海外利益的增加以及对海外能源进口的需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期待构成了中国发展海权的强大现实动力。中国海军在海权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战略转型,内容包括军种职能、技术形态、海军功能、兵力结构、作战理念、作战区域等方面。转型后的中国海军将是亚太地区一支重要的海上武装力量,其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更在于证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能够将其影响力投射到海上,

这种力量投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地区的海权战略格局。

注释

- [1] 杨震:《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 [2] 潘石英:《现代战略思考:冷战后的战略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 [3] 刘新华:《中国发展海权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 [4] [5]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 38; p. 224.
- [6]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 [7] 刘新华:《论中国的海外利益》,《党政干部参考》2011年第1期。
- [8]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May, 2010, pp. 4~5.
http://www.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PubLibrary/R.20100518.Air_Sea_Battle__A_/R.20100518.Air_Sea_Battle__A_.pdf.
- [9] 张可云:《国际经济地位变化与中日关系前景》,《湖湘论坛》2014年第1期。
- [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May, 2015, pp. 22~23.
- [11] 范晓军:《中国海军大踏步走向“蓝水”》,《世界军事》2016年第11期。
- [12]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 [13] [17]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第214页。
- [14] 天鹰:《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舰载武器》2016年第6期B。
- [15] 陈传民:《中国反制“分布式”杀伤的策略》,《现代舰船》2016年第23期。
- [16] 【美】李南:《问鼎海洋的中国海军——中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演变:从“近岸”至“近海”到“远海”》,《舰载武器》2015年第5期B。

(作者为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 萌